

● 德国史

# 论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邓红英<sup>1</sup>, 吴友法<sup>2</sup>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2.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邓红英(1976-), 女, 湖北武汉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德国史及世界史研究; 吴友法(1948-), 男, 湖北武穴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德国史和二战史研究。

[摘要] 20世纪70年代, 民主德国政府推行与联邦德国划分界限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这一政策限制了两德关系的深入发展, 虽然一度维护了民主德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局面, 但统一社会党政府最终无法切断长期历史形成的民族联系, 更不能在民主德国形成独立的民族意识。1990年的德国统一宣告了昂纳克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的失败。

[关键词] 昂纳克; 民主德国; 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中图分类号] K51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5-0606-06

20世纪70年代, 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开始解冻。由于担心两德交往威胁到自身的安全与稳定, 统一社会党政府竭力削弱两国在民族、文化以及历史等方面的联系, 企图通过德国国家与民族分裂的永久化来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然而, 这一政策最终加速了民主德国的消亡。本文主要对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影响进行分析探讨。

—

建国初期, 民主德国一度积极争取实现德国的快速统一, 但德国的分裂实际上却是进一步扩大。1961年, 柏林墙的修建使东西方以及两德之间的分裂现状被稳定下来, 西方国家还视之为德国分裂的最终完成<sup>[1]</sup>(P. 198)。此后, 民主德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 国家地位也不断提高, 而且还努力争取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其主权国家地位, 以实现在维持分裂现状基础上的两德的和平共处。但是, 联邦德国坚决反对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 还试图通过扩大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来扩大对民主德国的外交包围。1967年初, 独立自主意识较强的罗马尼亚率先和联邦德国建交, 东欧其它国家也对和联邦德国发展关系持积极态度。

联邦德国取得在东欧的外交突破后, 民主德国迅速采取了拉开两德距离的措施, 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初现端倪。如: 1967年2月2日, 民主德国将“全德问题秘书处”改名为“西德问题秘书处”; 2月21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籍法出台; 4月, 民主德国教会被勒令与联邦德国教会分开举行会议。统一社会党在4月17日到22日召开的“七大”上明确宣布: 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统治下的联邦德国与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统一难以想象; 民主德国和现在的联邦德国政府建立邦联在目前也是不可能的; 联邦德国统治力量阻碍了两德建立正常的关系<sup>[2]</sup>(P. 71-74)。

在联邦德国的勃兰特政府实行新东方政策后, 民主德国的安全和稳定面临着更大的威胁和挑战。

1969年10月28日,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在政府声明中,勃兰特开始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称呼民主德国,并提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20年后,我们必须阻止德意志民族继续互相分离地生活下去,我们要尝试通过一种正常的并存关系达到一种合作关系。”<sup>[3]</sup>(P.329)但勃兰特认为,俾斯麦统一德国以前,在共同的种族、语言、艺术、习俗基础上,共存共荣的德意志族群意识得以产生,二战后德国的分裂和两个德国的差异,没有改变文化的整体性,共同的文化使两德人民仍维持着强烈的共属感<sup>[4]</sup>(第181,182页);因而,两个德国互不为外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特殊关系。随着东方集团形势的稳定和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开始积极推动东西方缓和,对联邦德国新政府及其和解政策的态度十分积极。虽然美国担心联邦德国的东方政策会脱离控制,但为了避免难以应付的苏联的挑战在欧洲出现,又因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它也欢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在这种形势下,东西方缓和在欧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由于无法抵挡东西方缓和趋势及苏联的压力,民主德国不得不参与了缓和进程,然而在谈判条件、谈判内容以及谈判方式上又不断设置障碍。在苏联东欧盟国倾向于与勃兰特政府进行无条件谈判后,乌布利希及统一社会党政府决定依靠自身力量来维护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1970年12月,统一社会党中委会确立了与帝国主义联邦德国完全划分界限的政策<sup>[5]</sup>(P.261)。由于势单力薄,民主德国无法阻止东西方的缓和趋势,乌布利希被迫辞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在坚持民主德国的利益问题上,接任的昂纳克与乌布利希毫无差别,两人的不同是前者更为现实和灵活,愿意与苏联合作。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初,两德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两国进入条约关系时代。但是,民主德国并没有取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更不用说让其放弃德国统一目标,反而面临着如何在新环境下继续保持政权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題。昂纳克对联邦德国的威胁也是明晰于心的,他指出:“联邦德国有些颇有影响的势力,他们决不甘心民主德国的存在和我们的社会主义”,“这些势力所使用的手段是利用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共同的历史文化以及两德民众中存在的亲戚关系,以改变民主德国存在的现状”<sup>[6]</sup>(第340页)。尽管昂纳克生长于联邦德国的萨尔地区,但他极力否定两德存在于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他指出,“关于民族问题,历史已经有了定论……”<sup>[6]</sup>(第334页),即战后联邦德国继续存在资产阶级民族,而民主德国正在形成社会主义民族。昂纳克更强调的是民主德国国家及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为此,他采取了范围广泛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对内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认同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对外促进和苏东盟国的经济政治联合,其目的是尽量划分两德的界限和继续冲淡因长期隔绝而疏离的民族感情,从而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

## 二

分离政策,即德语“abgrenzung politik”。abgrenzung字面含义是“确定界限”<sup>[7]</sup>(第7页)。为了防范与联邦德国交往给民主德国造成的生存威胁,民主德国有意突出和扩大两德在各方面的不同,以在两国差异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德国独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实质上,民主德国的目的是实现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永远分裂,即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因而,本文将民主德国的“abgrenzung politik”意译为“分离政策”。在两德关系方面,统一社会党政府一方面充分利用两德合作的好处,一方面尽量削弱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公民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为此还采取了阻止两德人员来往、限制两德经济关系、强调民主德国主权地位以及塑造独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等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限制两德人员往来:在《基础条约》签署后,两德人员来往更加频繁,从1969到1980年,访问民主德国的联邦德国人数增长了158%<sup>[8]</sup>(P.69)。随着民间交往和交流的增多,两德人民了解增多、情谊加深,民众的联系也使民族联系得以保持,联邦德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也更为民主德国人民所了解,而这些都是主张两族论和反对德国统一的民主德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此外,民主德国也需要对两德人员来往的经济后果进行干预,因为联邦德国公民的大量涌入会使货物供应更加紧张,并会扰乱货币秩

序。虽然保持两德人道联系得到了有关条约的法律保障,但在实施过程中,民主德国可以采取种种合法措施来施加限制,其主要手段是:(1)通过申请程序对人员进行选择性的限制。在前往联邦德国之前,民主德国公民需要向国内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得到批准的多为退休者或政治可靠者,在涉及国家机密部门工作的人员被禁止前往联邦德国。联邦德国公民申请前来民主德国的程序也比较复杂,如必须提供一份有关“特殊家庭事务”的探亲证明,并要得到民主德国亲属的认证。通过申请程序,民主德国官员可以拒绝不受欢迎的联邦德国公民入境。(2)通过提高入境货币兑换额限制来访的联邦德国公民数量。在《基础条约》签订后的 1973 年,访问民主德国的联邦德国人数从 1972 年的 1 540 381 人猛增至 2 278 989 人。为了限制联邦德国人入境的大幅度增长,1973 年 11 月 5 日,民主德国将原定每天 10 联邦马克的入境兑换额提高到 20 联邦马克,并取消原来的退休者入境不需兑换的规定,这使 1974 年来访的联邦德国人数降至 1 919 141 人<sup>[9]</sup>(P. 94, 95)。

限制两德经贸关系深入发展:从 1949 年起,两德的经贸合作就一直存在,从 70 年代起两德的经济关系发展更加快速,如 1970 年两国贸易额是 45 亿联邦马克,1979 年增长到 99 亿,1982 年则达到 141 亿<sup>[10]</sup>(第 252 页)。尽管民主德国从两德经济关系特别是联邦德国的优惠政策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但民主德国并不愿过多地依赖联邦德国,如 80 年代中后期民主德国的经济形势恶化,统一社会党政府仍有意减少对无息透支贷款的使用,1984—1986 年使用额不足最高额的 1/3,而 1981 年使用量是 80%,1983 年是 71%。民主德国领导人还限制两德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直到 1987 年民主德国还限制和联邦德国建立合资企业。为了避免形成对联邦德国经济的依赖,民主德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一体化最积极的提倡者。此外,民主德国还努力提高自身的经济竞争力。

建立民主德国独立的国家身份: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民主德国就试图获得与联邦德国平等的国际地位。在法理上,民主德国认为德意志国家随着希特勒政权的溃败而灭亡,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是在德意志领土上建立的两个新国家;因而,两德都拥有德意志国家的部分继承权,两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民主德国也需要通过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来巩固其国家地位。两德建交后,统一社会党政府仍然努力争取获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因此,民主德国极力否认德国问题的存在<sup>[11]</sup>(P. 97, 98),主张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发展两德关系,反对联邦德国统一全德的要求。民主德国还彻底删除了法律文件中的德国统一目标,如 1974 年新宪法和 1976 年的统一社会党新党纲都去掉了对德国统一问题的规定。此外,民主德国还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的主权国家地位,与《基础条约》内容相违的是,民主德国在联邦德国设立的是驻外大使馆,隶属外交部,还极力强调其单独的国籍,反对联邦德国坚持一个德国国籍和在第三国援助民主德国公民。

塑造民主德国独立的民族身份:建国初,国家的分裂没有动摇德意志人的一个民族信念,民主德国一度积极争夺德意志民族的正统继承权,积极争取德国的统一,强调自己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保卫者,指责联邦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出卖民族利益。依据自身情况,民主德国哲学家阿尔弗莱德·科森还从阶级结构角度论证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族在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存在,民主德国是民族利益的“惟一代表”以及民族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社会<sup>[12]</sup>(P. 25)。20 世纪 60 年代,面对联邦德国大联合政府的外交攻势,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有所调整,开始采取一些扩大民族分裂的防守措施。为了反对勃兰特通过加强民族联系来实现德国统一的意图,民主德国开始否定一个民族理论,1970 年 1 月 15 日,乌布利希在记者招待会中以两德不再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来要求建立国际法中的两德关系,以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民族来拒绝两德统一<sup>[13]</sup>(第 175 页)。在 1971 年 7 月的统一社会党“八大”上,新上台的昂纳克对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作出了更大的调整,提出在民主德国正在形成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和在联邦德国继续存在资产阶级民族的“两个民族理论”<sup>[14]</sup>(第 600 601 页)。然而,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联系难以很快地人为消除,为了取得群众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昂纳克也不得不对两个民族理论加以调整。1974 年,在统一社会党中委会第 13 次会议上,昂纳克指出:民主德国公民的国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族是社会主义民族,民族性是德意志。

为了将两个民族理论变成现实,民主德国极力消除公民的德意志民族意识。统一社会党政府推行了“去德意志化”政策,如将大多数机构组织名称中的“德国”改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连民主德国的国歌也因歌词内容有“德国,统一的祖国”而被禁止演唱,改为以演奏或哼曲的方式表达。此外,民主德国试图建立独立的民主德国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昂纳克上台后,他采取了加强执政党的领导、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改善政府与宗教团体之间关系等等政策,目的是通过加强政治控制和改善社会、经济状况的措施来增强群众对政权的认同感,从而接受政府的民族政策。昂纳克还利用民主德国在各方面的成就来促成公民对独立的国家、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如:以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成就来增强公民的国家认同感;以民主德国在苏东集团的经济成就和地位来形成公民的民族自豪感;以民主德国超过联邦德国的历史进步性来强调公民对民主德国独立身份的认同感。因体育竞赛方面的成绩显著,民主德国还利用体育成就来提高公民的国家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sup>[3]</sup>(P.539-545)此外,民主德国还努力强化公民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认同,积极推动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联系的发展。80年代,民主德国的学者们还提出了德意志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试图在德意志、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民主德国民族身份。

### 三

面对联邦德国的实力优势和外交攻势,统一社会党政府推行了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最初,昂纳克的这一政策确实使民主德国成功地经受住两德交往带来的挑战。然而,1990年德国快速统一显示,这一政策并没有最终解决民主德国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反而加速了其消亡。

在昂纳克执政早期,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有效地维护了政权的稳定和发展。在两德交往开始后,民主德国一直对联邦德国保持高度的警惕,在与联邦德国开展合作的同时,还推行了限制两德交往和扩大两德差距的政策。两手政策使民主德国经受住了两德关系正常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在1989年苏东剧变前,民主德国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动乱,也没有出现难以控制的移民潮,反而还从两德关系中获得了许多利益特别是经济好处,如仅1985年,民主德国就从联邦德国政府和过境的联邦德国公民那里获取了9.28亿马克的收入<sup>[4]</sup>(第197页)。此外,在两德关系正常化后,联邦德国放弃了坚持惟一代表权的“哈尔斯坦主义”,从而使民主德国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而且,两德关系的改善也有利于维护两国之间以及欧洲的和平局面。可见,两德交往不仅没有直接危害民主德国政权的稳定,还促进了民主德国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是,昂纳克成功的基础却是德意志民族分裂的扩大,民族分离主义政策使两德人民之间的民族隔阂进一步加深。从20世纪60年代起,民主德国政府就有意识地强化公民的对独立的“社会主义民族”的认同,新的国籍法是在政治上确立民主德国公民不同的民族身份,两族论和社会主义文化概念是要塑造独立的社会主义民族身份。尽管两德不同的发展道路不会导致巨大的民族差异很快产生,民主德国最终也没有建立一种统一而清晰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感,但统一社会党政府有意识地强调两德的差异和所谓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感,确实也能对民族意识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然而,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德国长达40余年的分裂局面在1990年结束。民主德国的消亡和德国的快速统一显示,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是统一社会党政府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在世界日益走向相互依存的情况下,民主德国无法切断两个德意志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建立独立的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十分担心两德人民直接接触增加的“不良影响”,从而千方百计加以限制,但联邦德国往往利用经济手段迫使民主德国放松对人员交往的限制。如为了续签1975年到期的无息透支贷款协定,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的放宽入境兑换额的要求让步。而两德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等使新的民族意识难以在民主德国形成。70年代初,民主德国官方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最初并没有获得民主德国人民的普遍认同,有的人还发出“难道我不是德意志民族”的质

问,一些民主德国群众不愿意在 1972 年的奥运会上将两个德国的运动员分为两个代表团<sup>[12]</sup>(P. 96)。因为否定德意志民族属性不为群众接受,1974 年昂纳克承认民主德国人的民族性是德意志,从而放弃了在民族问题上彻底的“去德意志化”。为了不再纠缠于复杂的民族问题,昂纳克还强调“历史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但是,分裂国家的民族问题并不因一方的否认而得到解决,两德交流与合作也使分裂的德意志民族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80 年代中后期,为了通过历史联系和民族自豪感来保持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革潮流下的稳定以及顶住苏联的改革压力,统一社会党政府在外交上更重视联邦德国的援助和两德的友好关系,在内政上开始重新评价历史<sup>[12]</sup>(P. 131),而两德纪念共同的历史人物马丁·路德等使民主德国出现了重新关注民族问题的情况<sup>[16]</sup>(P. 90)。因而,尽管民主德国公民的民族认同存在模糊、复杂化和多样化等问题,但统一社会党政府也未能建立独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所以,尽管分裂达 40 多年,但两个德国的人民在文化、语言、宗教乃至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共同的历史渊源是无法改变的。两个德国的统一何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够实现,这也正是一个重要原因<sup>[17]</sup>(第 17 页)。

其次,统一社会党政府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极大地削弱了统一社会党的执政基础。由于高估了联邦德国的威胁和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统一社会党政府推行了民族分离主义政策,这使其失去了德意志民族主义力量的忠心耿耿的支持。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政策是将民主德国在民族问题上的话语权拱手相让,从而使联邦德国真正成为德意志民族的“惟一代表”。直到 1989 年动乱前夕,民主德国在民族问题上还是延续 70 年代以来的政策。1989 年夏,由于难以控制的移民潮不断涌现,昂纳克被迫下台,继任的克伦茨政府不得不逐渐放宽旅游限制,并于 11 月 9 日宣布出国旅行和移居国外可以经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柏林(西)之间的所有边境站出境<sup>[18]</sup>(第 156-161 页),这意味着开放了柏林墙。在柏林墙开放和倒塌后,两德人民的德意志民族情绪高涨并使事态的发展变化很快超出了统一社会党政府的控制。统一社会党不得不快速调整民族政策,放弃“两个民族理论”,提出了分阶段实现两德统一的方案。然而,由于无法化解社会危机,民主德国政府无法改变在民族统一问题上的被动局面。在民主德国深陷危机而不能自拔之时,联邦德国的科尔政府极力在民主德国群众面前塑造其德意志保护人形象,并很快就夺取了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主导权。克伦茨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德国统一社会党内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把民族问题视为已经结束,撒手不管,而没有保留一种左的民主解决的前景,这是民主德国近期历史的最大错误之一。”<sup>[18]</sup>(第 106 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分离政策使民主德国成功地克服了被迫开放国门后的挑战,但这种实为割裂民族联系的政策必然以失败告终,因为人为割断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以及血缘等维系的民族情结是不可能的,而正是民族情感成为德国民族和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

### [参 考 文 献]

- [1] SOWDEN, J. K. The German Question 1945-1973-Continuity in Change[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 [2] HOFMANN, J rgen. Es ging um Deutschland: Vorschläge der DDR zur Konfrondation zwischen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56 bis 1967[Z]. Berlin, 1990.
- [3] Herausgegeben aus Anlass des 125. Jubilaeums des Ausw rtigen Amts. Auss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Dokumente von 1949 bis 1994[Z]. K ln: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95.
- [4] 彭滂沱. 德国问题与欧洲秩序[M]. 台北: 三民书局, 1992.
- [5] HAENISCH, W. Geschichte der Aussenpolitik der DDR; Abriss[M]. Berlin, 1985.
- [6] [德] 埃里希·昂纳克. 我的经历[Z].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
- [7] 新德汉词典[Z].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 [8] PLOCK, Ernest D. East German-West 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Fall of the GDR[M]. Boulder, 1993.
- [9] WHETTEN, Lawrence L. Germany East and West: Conflicts, Collaboration, and Confrontation[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0.

- [ 10] 潘琪昌. 走出夹缝[ 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 11] PLOCK, Ernest D. The Basic Treaty and the Evolution of East-West German Relations[ M] .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6.
- [ 12] MCKAY, Joanna. The Official Concept of the Nation in the Former GDR: Theory, Pragmatism, and the Search for Legitimacy[ M] . Aldershot, Hants, UK; Brookfield, Vt.: Ashgate, 1998.
- [ 13] 张五岳. 分裂国家互动模式与统一政策之比较研究[ M] . 台北: 业强出版社, 1992.
- [ 14]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 德国统一社会党简史[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 [ 15] MAGDA LINSKI, Tara. Sports History and East Germany National Identity[ J] . Peace Review, 1999, (11).
- [ 16] CHILDS, David. The GDR: Moscow's German Ally[ M] . London, Boston: G. Allen & Unwin, 1983.
- [ 17] 晏小宝. 德国的统一[ M] .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2.
- [ 18] [德] 克伦茨. 大墙倾倒之际: 克伦茨回忆录[ Z]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 桂 莉)

## Delimitation from FRG: GDR Separate Policy during the Honecker Era

DENG Hong-ying<sup>1</sup>, WU You-fa<sup>2</sup>

(1. School of Humanit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 and Law, Wuhan 430074, Hubei, China;

2.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DENG Hong-ying (1976-), female, Historical doctor, School of Humanit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 and Law, majoring in German history and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WU You-fa (1948-),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German history.

**Abstract:** During the 70<sup>th</sup> Twentieth Centenary, in order to defend itself after the two German countries founded relations, the Honecker Government took up the national separate policy to delimit itself from the FRG. For a time, it was helpful for the GDR's stability to limit the deeply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German countries. However, the Honecker Government was unable to cut off the German national relations that was developed from a long history in the end and to found its separate national identity also. In 1990, it was clear from the Germany's unification that the GDR'S national separate policy failed.

**Key words:** Honecker;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national separate policy